

# 以新姿态争取属于文学的时间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文/图

“文学报刊是文学生态的‘培育者’，是时代精神的‘记录者’，更是连接作家与读者、贯通创作与传播的‘文化桥梁’。”这是12月3日，2025年度全国文学报刊联盟会员大会暨“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”颁奖会发出的倡议，传达出一个共识：争取属于文学的时间。

1971年，经济学家赫伯特·西蒙提出了“注意力经济”理论，认为信息过剩导致注意力稀缺，注意力成为一种有价值的经济商品。当下的信息时代，“注意力”与“流量”“经济”“收益”关联，文学及文学刊物也要与互联网上的各类内容争夺读者

“注意力”。调研机构 QuestMobile 今年上半年中国移动互联网报告显示，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跃用户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2.67亿，2025年中国人均每天刷手机的时间逼近8小时，手机已然成为主要的娱乐载体；据《中国经营报》援引中国网络视听协会《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（2025）》，截至2024年12月，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到10.91亿，市场规模超过12226.49亿元，网络直播是该行业重要领域。

简言之，用户海量的“注意力”与“时间”投入在了“短视频”与“直播”中。

广东《作品》杂志率先借短视频破圈。在征订广告短视频里，杂志社社长、主编王十月边沿马路狂奔边卖力兜售杂志，还推出打折、赠礼等福利；其他视频中，他还化身“文学医生”为投稿者开“处方”。视频出圈后，王十月在接受《南方都市报》采访时表示，编辑部做这类营销尝试，是希望在新传播环境下重塑影响力，触达更多文学爱好者。

前两年，中国文学期刊重镇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率先走进“东方甄选”直播间、“与辉同行”直播间，成功进行了“文学直播带货”。传统纯文

学期刊通过找到气质相投的顶流直播间，能够有效打破圈层，将优质内容送达数以万计的读者手中，完成了一次成功的、影响深远的“出圈”传播。这两次活动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传播史上的一个标志性节点，将文学期刊的线上推广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而现今，《天涯》杂志等文学名刊搭建了属于自己的直播间；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融媒体部推出了一档名为《文学三缺一》的文化访谈节目，每期邀请两位嘉宾与对话发起人一起，从某个文学话题聊开去，畅谈文学与人生、文化与社会。这些拥抱时代的传播潮流之举，在广大读者和作者中

引起热议。

拥抱“短视频”和“直播”，标志着文学期刊积极应对与时代的关系，通过“内容经典化，传播大众化”，积极走出符合时代的文学传播方式。

与作者的关系上，许多文学期刊保持“服务”姿态。比如秉持“不厚名家，不薄新人”用稿原则的《天涯》杂志，2025年先后推出了“自然来稿里的文学新人”“散文新锐榜”“新人工作间”“青年小说家”等专辑，发掘推介新人新作以及自然来稿。该杂志还在直播间中邀请名刊

编辑“教你上名刊、出书”，谈及的话题从出版现状到期刊生态，从新人投稿技巧到文学破圈老大难问题，连行业里“不好明说”的深度话题都坦诚相告。

与读者的关系上，更多的文学期刊保持“亲切”姿态。文学期刊往往被贴上“纯文学”“严肃文学”等标签，以致于“高冷”成为期刊在

许多人眼中的刻板印象。很多杂志社主编、编辑主动打破局面，如《作品》杂志提倡并践行“平民文学观”，鼓励编辑“走出书斋，走向大众”，注重“平民化、亲和力”，坚持新大众文艺的文学探索与实践。

## 文学期刊

### 作家的“书事”

《世界文学》2025年第6期，双月刊

每一位作家，都有一段和书有关的故事。最新一期《世界文学》杂志推出一组外国作家记述或评论藏书、理书、观书、读书、散书经历或现象的随笔作品，向读者揭示作家的“书事”。

“自由在触手可及的前方，要做的就是阅读，阅读，再阅读，期待能够摆脱命运的掌控。”这是博览群书的法国作家雅·博内的名言。他在《藏书癖》一文中，从枚举“小说中充斥着图书馆的身影”这一现象为切入点，列举了“有藏书癖的小说人物”。文中，他将有藏书癖的藏书家分为两大类：收藏家和书迷。其中，收藏家又可细分为“行家”和“囤书者”，行家往往有奇特的收藏癖好，比如关注某一个作者，聚焦一个时代或一种流派，专注一个主题或一种装帧等等；“囤书者”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完全无法控制藏书的数量，并且已经放弃了阅读堆积成山的书籍。藏书家中不乏有狂热的“书迷”，他们起初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对阅读充满了渴望，囤书是他们痴迷阅读的后果，而非最初的目的。

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布莱恩·埃文森关注阅读行为本身。他



在《独特的细节》一文里认为，书籍是奇特的存在，因为某种意义上，其物质属性并不重要。“书籍存在于不可思议的空隙，介于实体与非实体之间；在这个空隙里，一方面读者会觉得书的实体性并不是那么重要；另一方面，书的物质属性又与阅读经验密不可分。阅读经验之所以独特，正是由于捧在我们手中书册的种种细节。”作者留意的不是书籍的物质性，而是在纸质书上留下的物质性痕迹，并在这些痕迹上展开了共情式的描述。文章写道，“我们回想曾经读过的书，尤其是那些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书，所记起的不仅是文字，不仅是故事，不仅是形式和内容，还有阅读情境——对我们来说，阅读情境仿佛已经成为书本的一部分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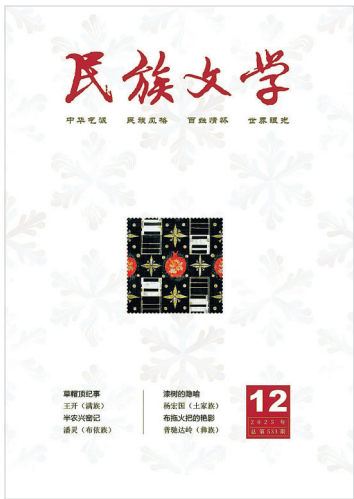
### “农民工二代”的典型书写

《民族文学》2025年12月号，月刊

当下，“乡村振兴的文学书写”命题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一个热点，更是一个连接历史、现实与未来的宏大叙事场域。最新一期《民族文学》杂志“小说头条”刊发布依族作家潘灵的中篇小说《半农兴窑记》，为“乡村振兴的文学书写”增添了一个典型“农民工二代”的人物形象。

“半农兴窑记”的题名中，“半农”即小说主人公罗半农。罗半农是一名“农民工二代”，从小在城市长大，但身份证的住址却是乡村。于城市，他是“城市私生子”；于故乡，他是“过客”。他在两头都不是“归人”。能够让他暂时栖身的，是其爱好：诗歌。从他的名字“半农”，不难让人想起著名诗人刘半农。但现实的落差很快让罗半农不得不重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。他在城市找不到工作，无奈回到家乡担任村主任助理一职。回家的第一天，他就陷入到身份认同的焦虑之中：“他甚至想起了他喜欢的诗句：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/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。”题名中的“窑”字，则蕴含着二重含义：一是地理位置，即主人公位于乌蒙山深处的虎窑村；二是一种民间工艺，虎窑村历史上陶瓷产业特别兴盛，村里出了不少制陶工艺的能人高手。但在现代工业体系的冲击下，虎窑村这种手工作坊式的陶瓷产业难以维系。

小说由此确定了人物角色与



故事的张力：主人公罗半农在“过客”的身份焦虑中寻找身份认同，故乡在工业体系的冲击下寻找振兴出路。随着叙事的展开，罗半农将自己的城市经历，转化为将乡村与城市沟通起来的能力，最终为故乡的陶瓷产业找到了出路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，主人公自己也由“过客”成为“归人”。

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先生对这篇小说有精到的点评：潘灵的《半农兴窑记》是写乡村振兴的，这篇小说充分体现了乡村振兴的主题意图，但机灵的潘灵又没有完全照着主题性写作的模板去写，他巧妙地融入了更多有意思的信息，既有一个农民家庭在经济大潮中的起落沉浮，又有民间工艺的起死回生，还有主人公从城市弃儿向乡村归人的心理转变。众多信息汇合在一起，让小说的生活质感更加充沛；众多信息又全部聚焦于“变化”这一点上，将乡村振兴的主题烘托得更加有光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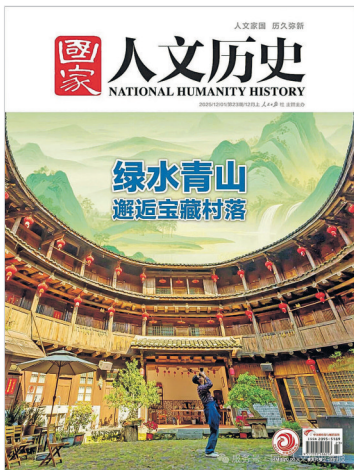
## 文史期刊

### 当“青山绿水”邂逅“宝藏村落”

《国家人文历史》2025年12月上，半月刊

2021年，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出“最佳旅游乡村”倡议，旨在通过评选和认可，推动旅游成为乡村发展的支柱。“最佳旅游乡村”评选也于同年启动，迄今全球有57个国家的236个乡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中国贡献了19个优秀典范：从引得樵夫入梦来的浙江下姜村，到万山夹缝中的徽商故里安徽西递村，到贵州黄岗村的侗族大歌，到充满乡情的重庆荆竹村……最新一期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走进这19个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讲述中国乡村的动人故事。

杂志逐一讲述了这19个“最佳旅游乡村”的故事：2021年，浙江余村从全球170多个参评乡村中脱颖而出，成为联合国旅游组织首批“最佳旅游乡村”。在余村村口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上刻十个红色大字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”余村正是从这里走向了世界舞台。旅客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如画的江南风景，更是一条从“卖石头”到“卖风景”，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奇之路；2025年10月17日，贵州黎平黄岗村成为“最佳旅游乡村”。黄岗村是一座侗寨，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。黄岗村最初是作为侗族大歌的典型保存地为人们所知，尤其以“侗族大歌”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于世。此次入选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让人看到了黄岗村的村寨建设“与自然共生的栖居范本”……乡村从来不是落后的代名词，而



是可以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诗意栖居地。正如杂志所描述的：这些宝藏村落以绿水青山为底色，以文化传承为灵魂，它们是活着的博物馆；在肇岭百年古戏台上，婺源徽剧正精彩上演；在溪头村，游客可以探访古龙脊，领略千年窑火的传承与变迁；在阿者科村，哈尼族传统民居“蘑菇屋”历千年犹存；桃坪村、基卡依村和扎尕那村的碉楼与榻板木屋，诉说着古老民族的建筑智慧；官洋村的客家土楼，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聚族而居传统文化的历史见证……

中国村庄的连续入选联合国“最佳旅游乡村”，充分展示了中国在乡村振兴、生态文明建设和文旅融合方面取得的成就，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“中国方案”。这些宝藏村落不仅是中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缩影，更为全球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点亮了一盏充满东方智慧的明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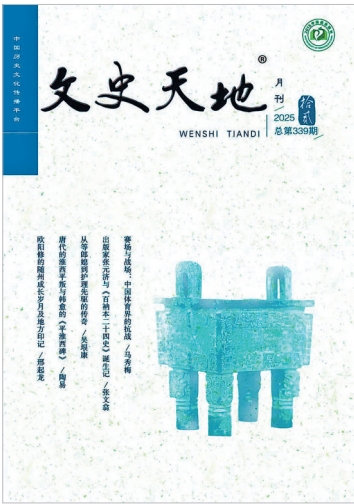
### 出版家张元济与教育家漆竹生

《文史天地》2025年12月号，月刊

最新一期《文史天地》杂志“人物春秋”栏目，推介出版家张元济与教育家漆竹生。

张元济，字菊生，1867年出生于广东，祖籍浙江海盐。他的一生有诸多的身份：首先是“翰林”，1889年与梁启超同年中举；1892年中进士，与蔡元培一道授翰林院庶吉士；两年后，入刑部任主事，后出任总理衙门章京。总理衙门章京是晚清时期处理清廷对外事务的官方机构，任职期间接触的是“外国的”“西方的”“新的”事物。其次是“改革家”，戊戌变法时期，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与康有为一同为光绪皇帝召见；再次是“出版家”，变法失败后离开京城，不再涉迹官场，投身上海的商务印书馆，从一名十九世纪的翰林化身成为二十世纪的出版家。正如文中所介绍的，张元济是中国近代文化史、出版史与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，以“教育救国”和“文化传承”为毕生志业，通过主持商务印书馆、整理古籍、革新教育等实践，深刻推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。

文章详细介绍了张元济主持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校勘出版工程的前前后后。作为中国传统正史的总集，《二十四史》自乾隆年间武英殿本定型后，长期存在校勘粗疏、文本篡改等问题，而张元济以“书贵初刻”为原则，广搜宋元善本，终成这部兼具文献价值与文化象征的典籍瑰宝。作者认为，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堪称近代文献整理的巅峰之作，不仅填补了清代朴学未竟的善本汇刊遗憾，更在战乱频仍的年代为中华文明存续筑起学术防线。与此同时，这部大书清晰地勾勒出了张元济的认知理念与实践之路，即：若中国人不能获得



良好的教育和具备充分的知识，中国就不能实现真正的现代化；没有现代知识的传播，没有更广泛的对变革要求的觉醒，中国无法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；传播各种知识以救中国，通过文化手段使中国走向现代化。

毕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的漆竹生先生，191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，就读于北平中法大学附属中学期间，不仅接触到各种进步思想，而且通过学校开设的国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法文等现代课程学习，打下了较好的文化知识和法语基础。高中毕业后，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。文章介绍了他从“科学救国理想”转向法语与法学教育事业的过程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：翻译的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·潘什梅尔的著作《法国》，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法国的重要窗口；组织编纂的工具用书《法汉大词典》，对提高全国的法语教学和科研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此外，他还结合教学工作撰写了《西洋外交史》《民法概要》《经济思想史》等多部著作手稿。

## 读书期刊

### 学者的“医学文化”通俗化写作

《书屋》2025年12月号，月刊

最新一期《书屋》杂志“书屋讲坛”栏目聚焦学者余凤高的“医学文化”通俗化写作历程。

余凤高先生是浙江省社科院文学任研究员，译有《阿辽沙锻炼性格》《弗洛伊德及其他》，学术专著有《鲁迅杂文与科学史》《〈心理分析〉与中国现代小说》《创作的内在流程》《他是谁：外国文学名著人物原型》《西方性观念的变迁》等。他的创作除了学术文章，还有另一面向，即“医学文化”通俗化、科普化写作。这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。据作者介绍，他的妻子是医生，曾建议他学点医学，能够开方子，以便未来可以保养自己的身体甚至可以借此谋生。因缘巧合之下，他在图书馆“自然科学”类杂志中，看到了许多十分有趣的医学史文章。

在广泛的翻阅中，余先生发现《英国医学杂志》《柳叶刀》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和《皇家医学会杂志》等医学刊物也不时发表几篇医学史的专题文章，他以此为兴趣点，系统、全面地阅读《医学史》等医学文化著述。通过阅读，余先生产生了一个想法：医学是所有自然科学中与人具有最直接关系的学科。“我认为医学是自然

### “乐天派”苏轼

《书城》2025年12月号，月刊

关于“乐天派”，用小说家的语言表述，是罗曼·罗兰的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”；用诗歌的语言，是泰戈尔的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要报之以歌”。这些句子都可以当做苏轼的注脚。最新一期《书城》杂志刊文，回望“当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当如何报之以歌”的苏轼。

文章从北宋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切入，苏轼时年43岁。这是苏轼的人生转折之年。到任湖州知州不足四个月，苏轼在官署中被朝廷使者革去官袍，押解北上。宋人孔平仲在笔记《孔氏谈苑》中记载了苏轼被逮捕的场景：“顷刻之间，拉一太守如驱犬鸡。”当押解的官船行至太湖深处，风浪大作，苏轼万念俱灰，曾欲投水自尽，终因不忍连累家人而作罢。苏轼在狱共计130天，受牵连者达数十人。这就是北宋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以此生死际遇为线，此前是“苏轼”，此后是“苏东坡”。

“苏轼”成为“苏东坡”的过程，就是“当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当如何报之以歌”的历程。文章写道，苏轼直面死亡的极致体验，深刻地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，“如果说他早期的豪放是才华横溢的挥洒，是‘有笔头千字，胸中万卷，致君尧舜，此事何难’的自信，而经历史死拷问后的旷达，则是穿透悲剧本质后的澄明与和解。”作



科学中的‘人学’，人类绝大部分的疾病都与人类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宗教、文化关系密切。”这促使他开始撰写《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》方面的随笔。

这些随笔相继在各个期刊发表，并最终集结为《病痛背后的奇观：人类疾患的背景文化》一书。在此基础上，余先生又拓展写作范围，他认为人类的疾病只是它的一个方面，医学应该包括生理学、病理学和治疗学三个方面：生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正常生理，病理学研究的是人的异常生理，这两方面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治疗学，也即医治人的疾病。基于此，他继续撰写了《解剖刀下的风景：人体探索的背景文化》和《病魔退却的历程：寻求治疗的背景文化》等通俗化著述。



者认为，苏轼入狱后在黄州的贬谪生活，给了他大把独处与沉思的时间，早年积淀的儒、释、道思想在苦难的熔炉中开始剧烈地反应、融合，儒家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已然受挫，他转而向道家的自然哲学和佛家的心灵智慧寻求解脱，这种解脱并非简单的逃避，而是创造性的转化。于是诞生了《苏赤壁赋》的哲思，“大江东去”的豪迈，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……文章认为，苏东坡至今仍给人以启示：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苏轼留给我们的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，而是深入生活的智慧；不是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，而是面对问题的创造性姿态。当我们学会在风雨中保持内心的旋律，在困顿中开垦精神的田园，在平凡中发现生命的神奇，我们就在实践着这份穿越千年的智慧——在时代的激流中，找到安顿自我的永恒力量。